

改革運動的修辭學探析^{*}

肖小穗

摘要

改革運動歷來是學術研究的熱門課題，遺憾的是，無論是就廣義的改革運動還是就最近40年來中國的媒體改革而言，我們至今缺少一個修辭學的視角。例如傳播學的學生和學者大多偏向傳播社會學的研究，或傳媒歷史學的研究，或媒體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即便是從媒體的話語入手，也是偏重量化的內容分析或宏觀的結構性話語分析。從某個意義上說，修辭學視角的缺席意味著一個細緻入微的文化視野和一個審時度勢的改革「主體」的缺失。

關鍵詞：改革運動、修辭學分析、文化視野、改革主體

^{*} 本文改寫自2022年11月25日肖小穗教授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一場專題講座的講稿。

肖小穗，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學系榮休教授。研究興趣：修辭傳播、文化研究、中國傳播理論。電郵：s82299@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3年1月26日。論文接受日期：2023年2月20日。

Rhetorical Insights into Reform Movements

Xiaosui XIAO

Abstract

Despite the significa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topic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academic research, it has not been explored in an organized fashion from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either media reform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r modern Chinese reforms in general. Most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communication have preferred to apply a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or 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topic. Even when discussing media reform discour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tended to rely on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and discourse structural analysi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as far as reform movement studies are concerned, the lack of rhetorical insights into the movement implies the absence of both a meticulous cultural vision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a movement that acts with purpose and skill.

Keywords: reform movement, rhetorical analysis, cultural vision, subjectivity of reform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o, X. (2023). Rhetorical Insights into Reform Movement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4, 207–238.

Xiaosui XIAO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tudies,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ies.

30多年前，我還是碩士二年級的學生，偶爾讀了一篇修辭分析文章“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Grammar of Culture: The Case of Darwin’s Origin” (Campbell, 1986)，作者從一個特別的修辭學視角重新分析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分析的目的是要用一個「文化語法」(the grammar of culture)的概念回應一本在學界走紅多年但有爭議的書——Kuhn (1962) 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學革命的結構》)。分析顯示，達爾文成功利用了自然神學的一套文化語法來闡述他的進化論，從文化語法的角度看，科學革命並非Kuhn所說的那種相對封閉的突發的範式革命，科學革命是漸進的、累積的。這篇文章的境界之高，格局之大，而分析起來又如此之精細，讓我恍如醍醐灌頂。與這篇論文的因緣際會決定了我後來的學術生涯，它把我引入了修辭傳播這個領域，也讓我義無反顧地走進了改革修辭這個研究課題。

「改革」在中國是個百年話題。鴉片戰爭之前就有人鼓吹改革了，我們今天還要月月講，天天講。事實上，過去一百多年來改革的薪火從未間斷過，我們從帝制改到了共和，又改到了社會主義這個政體上。1949年以來，大大小小的運動都是改革運動，範圍遍及政治、經濟、文化。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更是用「改革開放」來概括最近四十多年來的发展，而剛過去的共產黨二十大還在呼籲要「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團結奮鬥」。看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改革還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軸。這路漫漫其修遠的改革之途，自然就成為了過去一個世紀來海內外中國研究的重中之重。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有關中國改革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拓展、深耕和細化。

今日重訪「改革運動」這個課題，是要促請同行關注這一重大課題研究的一個缺憾，在各路熙熙攘攘的改革運動研究中，我們至今缺少一個修辭學的視角。以過去四十年來的中國媒體改革研究為例，研究者大多偏向傳播社會學的研究(聚焦與媒體相關的社會行動)、傳媒歷史學的研究(聚焦重要的媒體事件)，或媒體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即便是從媒體的話語入手，也是偏重量化的內容分析或宏觀的結構性話語分析。本文旨在強調修辭學視角在改革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其作用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非可有可無。在我看來，修辭學視角的缺席意味著一個細緻入微的文化視野和一個審時度勢的改革「主體」的缺失，而理解這個文化視野和改革主體對我們完整地把握中國的改革運動至關重要。

如此表明這一立場，本文自然要清楚地解釋修辭與改革運動、文化視野，以及改革主體之間的密切關係。這四個概念本來就相互牽連在一起，說其一，就不能不說其二、其三、其四。在以下的部分，就讓我依次回答這樣四個問題：

1. 甚麼是改革運動？
2. 甚麼是修辭？
3. 為甚麼說文化視野的缺失？
4. 為甚麼說改革主體的缺失？

甚麼是改革運動(社會運動)

甚麼是改革運動？我們不妨借鑒一下西方學者的看法。西方學界通常把改革運動和其他群體性運動劃入社會運動的範疇，社會運動具有改革運動所有重要的特徵，譬如要求社會變革、運動有組織、有一定規模、有一定程度的反建制行為等等。¹與「改革運動」相比，「社會運動」在西方有更為系統的論述。

90年代，一位美國學者 Garner (1997) 回顧了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運動理論和研究的發展，將這一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前期從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從60年代到70年代，後期從70年末到90年代，差不多20年為一期。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核心主題，用 Garner (1997, pp. 7, 17, 30) 的話說，這三個時期的核心主題依次為「強調運動的非理性」(emphasizing the irrational)，「作為理性行動者的運動」(movements as rational actors)，和「解構運動」(deconstructing movements)。值得關注的是這三個時期研究的理論範式和學術取向，Garner發現每個時期都有數個主導的理論範式，它們相繼或同時引領一個時期的研究。儘管如此，每個時期的理論範式又都相互依存，顯示它們分享一些基本的學術和價值取向。

社會心理取向 (1940 至 1950 年代)

前期的社會運動研究受當時帶有種族、等級、社區情緒和偏見的群體動亂事件的負面影響，研究者往往把社會運動看成是負面和非理性的，在他們眼中那只是一群偏執狂躁的人的破壞性發洩。研究者於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解釋社會運動的起因，譬如一些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精神分析把參與社會運動歸咎為失意者的人格特徵或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缺陷（參閱 Hoffer, 1951; Reich, 1946; Seeley, 1967）。這時期流行的理論範式，包括精神分析學範式 (psychoanalytic paradigm)、集體行為範式 (collective action paradigm)、大眾社會範式 (mass society paradigm) 等，積極配合了這一社會心理取向的研究。

社會結構／理性選擇取向 (1960 至 1970 年代末)

60 年代，美國境內人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此起彼伏，促使學者轉變態度，把社會運動視為通往社會進步、民主和平等的合理手段。學者於是從宏觀的社會結構和微觀的理性選擇入手探尋運動的合理因素。最先啟動這一學術轉向的理論範式是結構緊張範式 (structural strain paradigm)，隨後興起的馬克思主義範式 (Marxist paradigm) 和資源動員範式 (resource mobilization paradigm) 加速並完成了這一轉向，這些範式都認定社會運動能採取合理的行動改變不合理的結構狀況。

從微觀的角度看，這時期的社會運動研究大多相信運動參與者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功利的。這一功利的看法主要來自於在 1965 年所發表的一本書——*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集體行動的邏輯》）。作者 Olson (1965) 是一位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假說，認為「群體行動」本質上是功利的，人的不滿情緒一般不會輕易轉化為具破壞性的群眾運動，因為行動是要付出代價的，尤其是高風險的行動，譬如學生罷課，輕則修不夠學分，畢不了業，重則開除，於是就要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核算。這個假說也捎帶出一個叫「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便車」(free ride)的假設，這個假設可以解釋群眾運動中投機分子的行為。每個運動都有些投機分子，他們參加行動只是為了瓜分運動的勝利果實。在這個理性選擇假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源動員範式，主導了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長達十年的社會運動研究。

文化話語/意義建構取向(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

第三時期被稱為解構時期。60和70年代社會運動的問題逐漸顯現，民權運動在美國贏得了政治和司法的承認，但沒有能夠解決有色族群的貧困和普遍存在的種族主義；一些激進的反殖民運動、人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引發了部分人的反彈和反向的運動(countermovements)，導致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原旨主義和右傾保守主義的復興，運動作為社會進步和民主發展動力的正面形象也因此備受質疑。偏偏在這個時候從大洋彼岸刮來一股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風潮，「過去理論家認為社會和人物個性是穩定的結構，現在則被理解為只是話語和互動的過程」(Garner, 1997, p. 6)。新問題和新思潮要求學者在更長的時間框架內和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上來考察運動，尤其要「更多地關注運動的信仰系統和話語框架」(p. 30)。這時候的運動研究甚至要來探討運動與過去의思想和話語傳統的淵源(p. 44)。80年代陸續有研究轉向從意識形態、話語框架、身份建構、集體認同等角度來解釋社會運動，這些轉向最終彙聚成一個以宏觀的文化話語和微觀的意義建構為主要切入點的新研究取向，與意識形態、框架建構、身份認同等概念相關的理論也就成為了這一研究取向的主導範式。這時期從歐洲傳入的新運動(new movement)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一取向的社會運動研究。²

在微觀的層面，這一研究取向的重心從功利主義的資源動員轉向了非功利主義的意義建構或意義動員，研究者分享一個基本假設：參加運動的人在乎的是「意義」，他們在追求某種意義。「意義」的面向更廣泛和多樣，它可以是物質上的、功利的；但也可以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譬如一個人為了某個他認為是正義的目的，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所有，包括自己的生命。事實上，人們參加一個社會運動的動機是複

雜的，不少人是衝著運動的某個崇高目標來的，但也有一些人僅僅是要表達對政府某些做法的不滿，也有的可能只是要在自己喜歡的人裏獲得某種認同。這樣，運動的發動者就要有一個周詳的意義建構，他需要賦予運動足夠豐富的意義，以便把盡可能多的人爭取進來。沒錯，每個參與者都有自己看重的東西，但起碼來說，發動者要讓這些人覺得參與運動是有意義的。譬如那個不滿某種社會現象的人意識到只有參與運動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現象；而那個想獲得認同的人會認為僅僅喜歡某些參與者是不夠的，還必須設身處地去理解和欣賞他們的信念。這樣，運動就把這些參與者所追求的意義連接起來，運動成了眾人的運動，而不是某個人的運動。從這個基本假設出發，學者認為他們要特別關注意義的建構、意識的提升、對符號的操控以及集體認同感是如何引發社會運動的（參閱 Morris & Mueller, 1992, Preface）。

Garner (1997) 這篇 58 頁的長文只寫到 1997 年，有關 1997 年後的發展，我們可以參考 2013 年發表的《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作者馮仕政更為詳細地梳理了美國社會運動研究的發展脈絡。他所整理和引述的最新文獻資料顯示，美國 80 年代形成的研究取向和理論範式（例如框架建構範式）在 21 世紀繼續展示出強勁的生命力，Garner 有關第三時期的許多論述和分析至今依然有效。

修辭學研究取向？

接下來的問題是，就未來的社會運動研究而言，我們是否可以期待一個修辭學的研究取向和理論範式？目前提出這個問題並非為時過早，讓我們來看一下上個世紀以來修辭學者自己的社會運動研究。修辭學者一直在關注社會運動，他怎麼可以放過這個讓修辭大放異彩的舞臺？運動領袖的魅力、犀利言辭和鼓動能力也著實讓修辭出盡了風頭。但也應該承認，早期修辭學者關注的重心還只是一些雄辯的運動領袖的激情澎湃的演說。到了 50 年代，修辭學者不再只是關注個別運動發動者的修辭，他們要來研究運動自身的修辭模式，尤其是「運動中公眾演講的模式、話語的構成、說服的特徵」（Griffin, 1952）。可惜那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時候修辭學者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框架，他們借用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理论框架，他們看到的運動是歷史運動和社會運動，修辭學者在此只是幫助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解釋這些運動。

到了70年代，修辭學者對社會運動的看法和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72年，一位叫Robert S. Cathcart的美國修辭學者發表了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ovements: Defining Movements Rhetorically”(研究運動的新取向：從修辭的角度界定運動)。文章宣告社會運動本質上是修辭運動和傳播運動，很多修辭學者接受了這個觀點，從那以後，研究社會運動成了修辭學者當仁不讓的份內工作。

我要說的是，在修辭學領域裏，社會運動研究也經歷了從歷史學、到社會學、再到修辭學自己的理論範式轉移。70年代Cathcart的文章把社會運動研究堂而皇之地收歸修辭學門下之後，修辭學自己的理論範式也經歷了從較小的修辭觀躍進到較大的修辭觀的視角擴展。我有幸讀到的那篇關於達爾文《物種起源》的修辭分析，就來自一個比較開闊的修辭視角。

我們今天認識的修辭已經跟過去大不一樣了。過去，修辭只是在漂亮的句子和文章裏，或者在大庭廣眾的慷慨陳辭和激烈爭辯中看到；現在，修辭就在我們的周圍，我們就生活在各種修辭建構的時間和空間裏。修辭學者已經開始用「修辭」這個概念來逐步取代像「歷史」、「社會」這樣的大概念，譬如他們逐步擺脫了對「歷史情境」(historical situation)的依賴。就拿改革話語來說吧，我們過去認為改革話語是對變化了的歷史情境的回應，當歷史情境發生了變化，我們的言行也要順應變化，與時俱進。但是今天很多修辭學者認為不是這麼簡單的，人不是簡單的感應器，人不會對所有變化都作出回應，人只回應某些類型的變化；人也不會直接回應外部的變化，人會做通盤的考量，他要考慮的不僅僅是外界的變化。所以修辭學者認為，改革話語和其他修辭性話語，其實不是在回應那個客觀的歷史情境，而是在回應一個更為複雜的情境，這個讓修辭話語不能不作出回應的情境就叫「修辭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它包括了歷史事件，但也包括了

許多別的東西，其中文化和話語傳統是構成修辭情境的重要因素（參閱 Bitzer, 1968; Consigny, 1974; Garrett & Xiao, 1993）。

我們再用新聞媒體作為例子，外面有大事發生，媒體即時作出回應，記者採訪、寫稿，用最快的速度播出或者登出。看起來，新聞媒體的確是直接回應了外界的變化；可是說到如何報導，就不完全由外面那個事件來決定了。那媒體到底在回應些甚麼呢，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新聞記者也許已經發現，不管外面發生了甚麼，那套用來解讀那是個甚麼事件的解讀密碼（codes）已經預先給他們準備好了，他們想去說一個甚麼故事的故事框架也已經準備好了，他們也許只是改變了故事裏面的一些可變項，譬如具體的人物、時間、地點、行動方式等，但是基本的故事框架延續下來了。所以說，媒體並沒有直接回應外部的變化，因為中間有一堆因素在影響媒體如何回應，甚至影響媒體何時作出回應，前面提到的「文化語法」就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跟「文化語法」一樣，「修辭情境」也是一個格局較大的修辭概念，它把我們帶到更廣闊的場域上來考察社會運動。

修辭學理論能否被其他學科接受為新的理論範式，這視乎其他學者是否認同修辭學者對社會運動的定義。但是後現代以來學界的種種發展跡向表明，學者的修辭意識已經普遍提升，學界到處都在講修辭，就連數學和音樂的學術刊物上都可以看到修辭分析的文章，由此看來，一個跨學科的修辭學理論範式不是沒有可能。再來看以上三種研究取向遞進的趨勢，修辭學研究取向已經呼之欲出了，既然學界已經鎖定「意義建構」作為考察社會運動的重心，自然就要進一步分析和評價這一意義建構的策略和技巧。既然學者要來考察運動的「集體認同感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自然也要追問在這個過程中是否有人採用了有效的修辭傳播手段，成功地賦予這個特定群體及其行動一個特別的意義，並且讓這個意義成為了每個成員共同追求的目標。

說到這裏，我們已經進入了修辭學的領域，接下來的問題便是：甚麼是修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甚麼是修辭

前面只是說了修辭學的一些看法，還沒有正面回答修辭是甚麼。下面從四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這些方面會讓我們更清楚地明白改革與修辭的關係。

修辭是一門說服的學問/藝術

首先，修辭是一門說服的學問和藝術，這是最經典的解釋。改革需要說服，所以改革跟修辭聯手是必然的。當你覺得生活還挺美滿，過去那套東西還管用，你不需要被說服去繼續過這樣的生活和繼續沿用那套東西，但改革需要。我們今天說的改革，是體制內的某種變革，所以需要一場運動，需要發動群眾來形成一股足以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改革意味著很多人要割捨自己幾十年來、搞不好還是祖上好幾代人傳下來的做法；改革還是一項高風險的作業，因為你不確切地知道改了以後會怎樣；改革還是一種承諾，承諾各種好處，但目前你只能畫一張大餅；改革還是艱難曲折的，你和你的人還得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這一切都決定了改革要有充足和正當的理據，要有一套完美的說辭，這就是為甚麼改革運動需要「意義建構」。

但是如此重要的修辭說服，卻往往被關注改革的人所忽略了，導致我們至今缺少一個修辭學的視角。為甚麼會這樣？僅僅是因為修辭分析的難度高一些嗎？我想還有別的原因。在聲勢浩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中，最賞心悅目的是那些轟轟烈烈、大刀闊斧的改革行動，相比之下，循循善誘、細緻入微的修辭過程黯然失色。我們的眼光大都停留在社會行動的層面，學者自己也偏好描述改革運動中那些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場面，那些跌宕起伏、峰迴路轉的戲劇情節，和那些慷慨激昂、壯懷激烈的高光時刻，光是把那些寫出來就已經很帶勁了。這樣一來，行動背後這個細水流長的修辭說服便顯得淡然無味。

我擔心的是，如果忽略了這個修辭過程，我們會簡單地看待近代以來的改革運動。歷史上有過不少浮躁的社會運動家，可能是看重了風光的視覺效果，片面追求激烈的言辭和強硬的鬥爭姿態，以為這才

是最好的大眾說服策略，這種浮躁的運動已經被屢屢證實是好景不長的。一場改革運動不是靠個別人振臂一呼、大家揭竿而起的史詩般的英雄行為就可以搞定了的，更何況我們現在說的是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運動。我相信修辭說服、大眾傳播才是解釋一場成功的改革運動的關鍵。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不是行為層面上的改革，而是思想層面和理解層面上的改革。而思想和理解層面的改革偏偏不能靠大刀闊斧、快刀斬亂麻，它只能是一個循循善誘、和風細雨的說服過程。

這就是為甚麼研究中國近現代轉型的西方史學家們很少去寫這段動盪的歷史，他們更願意去寫這時期的思想史。社會行動有目共睹，大家看到的都差不多，這方面的改革歷史有兩三本就夠了，但思想史方面的書出了很多。西方學者也很想瞭解中國的這段歷史，但他們知道要深入理解如此翻天覆地的歷史轉型，還得從瞭解中國人的思想和文化入手。

接下來要問的是，這時期的改革思想又是怎麼來的？它來自改革家們的書寫，來自以各種管道傳揚開來的改革話語，思想就活躍在改革家文字和話語的細節裏。所以西方的思想史家要仔細研讀像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章炳麟、劉師培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著作。其實我們讀的文獻是一樣的，思想史學家們讀甚麼，我們也讀甚麼，修辭學閱讀和思想史閱讀的區別在於，他們更多地關注改革家們說了甚麼，而我們更關注改革家們怎麼去說。思想史的閱讀方法適合在一段較長的歷史時期展現某種思想的演變，而我們的閱讀方法適合在每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通過一個個重要案例的深入分析，來展示這個節點上話語和思想的來龍去脈。現在有些學者寫新聞改革思想的發展或新聞改革理論的沿革，基本上採用思想史的寫法。應該說各有長處，我們進入文字的程度要比思想史更深入細緻，但通過一個案例展示出來的視野就沒有那麼寬廣。

目前思想史的做法有個問題，它給我們留下一些思想的斷層或裂縫，你不很清楚那個新的觀念或說法是怎樣出來的，又是如何在社會的層面上流行的。我曾戲稱修辭學者是思想史的泥水匠，是專門糊抹那些斷層和裂縫的，我們就是那個修補意義的人。我在一篇文章裏說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過，思想史研究的終點正好是我們的起點，他們退場之時，便是我們登臺之日(肖小穗，2014)。

修辭是一種講究變化的話語

修辭還是一種講究變化的話語，修辭不能容忍陳詞套話，它總要變換不同的說法。在這個意義上，我可以說修辭就是一種變法，看起來，它在變換不同的方式說同樣的東西，但問題就在這裏，我們真的是在說「同一個東西」嗎？譬如我今天說「修辭」，我在轉換不同的方式說修辭，單單一個「修辭是甚麼」的問題，讀者會聽到四種不同的說法。是的，從一個方面看，我是在說同一個東西；但從另一個方面看，每一種新的說法都讓這個東西的義域(意義的場域)發生微妙的變化。我們不是在說「同一個修辭」，新的說法給了修辭一個被那樣去言說和被那樣去理解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在那個方向上繼續說下去，這樣，一個新的言說和理解的通道就此開啟了。

修辭每天都在活躍和豐富我們的語言，與此同時也在拓展我們言說和理解的疆域，從這個意義上說，修辭豈止是講究變化，它就是一種製造變化的話語。莎士比亞有一句大家熟悉的名言：「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們不需要找一千個人，我們只需要找一位修辭家，讓他說一千次——當然前提是給他足夠的時間，你會聽到一千個不同的哈姆雷特，因為這位修辭家不會情願去說同樣的話。

修辭是一種全方位開放的話語

修辭還是一種全方位開放的話語，它不只是適合某種類型的改革，它適合各種類型的改革。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說修辭是一種特別的能力，一種「不管碰到甚麼事情都能發現可資利用的說服手段的能力」(轉引自劉亞猛，2018：63；參閱亞里士多德，2005：1355b)。西元前3世紀一位叫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的修辭家(智術師)說得更絕，「針對一切事物都存在著兩種相反『又都講得通』的說法」(轉引自劉亞猛，2018：37)，意思就是，對任何事物，你都可以說它好，也可

以說它不好，好在哪裏，不好在哪裏，提供這些說法的就是修辭。沒有人比修辭家更清楚地知道，語言本身有各種「意義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語言有被各種演繹和各種理解的可能性，只是看你如何開發這些潛在的可能性。

可以說修辭這門學問和藝術，天生就是衝著改革來的。修辭本來就是改革時代的產物，在西方，修辭術 (rhetoric) 作為一門專項的技藝和職業，誕生在西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那時的希臘正經歷一場從貴族特權到公民民主的社會變革，這場變革造就了一代叫「智術師」(Sophists) 的修辭家，他們以修辭為業，絕頂聰明，口才了得。作為西方第一代修辭家，智術師從一開始就以各種方式介入到改革中去，他們為政治家寫演講稿，為公民打官司，還開門辦學。根據一位美國學者的考察，「他們講授的修辭至少創造了兩種新的可能性：第一，弱者挑戰強者的可能性；第二，為已經僵化的話語行為注入活力的可能性」(波拉克斯 (Poulakos)，2014：18)。

說到這裏，我不想讀者有所誤解，以為修辭家想說甚麼都行，哪怕是顛三倒四、指鹿為馬，不需要為自己說的話負上責任。有這樣的人，就是那些詭辯家們，可幸的是這樣的人成不了氣候，群眾不是好糊弄的，所以這裏還必須強調另一個觀點：修辭是「合法的偏離」或是「偏離的合法化」。

修辭是「合法的偏離」或「偏離的合法化」

當今的修辭創意喜歡筆走偏鋒，但筆走偏鋒不等同於口無遮攔，兩者的區別在於修辭家筆走偏鋒的時候，已經預先做了很多鋪墊，事後也做了很多補充，讓你感覺就是偏，也偏得有它的道理。內地的學生一定看過這樣一個廣告，廣告裏面的人是斜著走出來的，這是脈動水的廣告，斜著身子在此比喻人的狀態不佳，喝了脈動水之後，身子立馬就正過來了。這個廣告創意夠偏了吧，我一個學生分析了最早一輯脈動廣告(脈動廣告，2020年4月26日)，認為這個廣告的創意不錯，用他的話說：「該廣告片的創意在於，沒有用多餘的語言來修飾、形容，只用一個簡單的傾斜方式，很好地表達出了主人公的身體與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神不佳……」我倒覺得不是這麼簡單。我給這個學生的評語是，這個廣告的真正創意不在於這個「簡單的傾斜方式」，而在於周圍符號的巧妙配合，正是由周圍符號所構建的情景(人長時間斜靠在書桌上苦讀所陷入的一種精神幻覺)合法化了這個「傾斜」的創意。在我看來，一個修辭作品的功力不表現在它怎麼偏離，而表現在它如何合法化這一偏離。

其實我們在改革中碰到的難題是一樣的，發表一通偏頗的言論是容易的，繼續維持它偏離的姿態，但是在意義上把它扳回來，這是難的。改革的合法化當然不是同一層級的合法化。合法化一個修辭創意(廣告創意也是修辭創意)，也許只需要把幾個符號擺弄一下，形成一個合理的構圖或敘事就已經巧妙地解釋了這個創意。但改革的合法化是一項浩大的意義工程。像「洋務」、「維新」、「共和」、「新文化」、「科學」、「民主」這樣的新觀念，任何一樣推行，都意味著要對舊的概念系統和意義系統來一次重新佈局。問題是，中國的改革家們還只能從自己的文化土壤裏發掘可供使用的說服資源，因為這是他們熟悉的、可以得心應手使用的說服資源，這些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可資利用的說服手段」。

改革修辭家還不能借用天外飛仙的法子，把西方某個神明請進來，直接把本地頑冥不化的小鬼打壓下去，這樣連說服的功夫都省下了。像科學、民主這些在今天奉為神明的觀念，當初傳入時中國人還不知道它們是何方神聖，它們自身的合法性還需要得到本土文化的確認，它們的神聖地位還不能由西方人來評定，要中國人自己說是神明，那才是神明。今天的人明白科學、民主是怎麼回事，再回頭看過去，就覺得不可思議，認為中國就是要現代化，就是要走這條路，這不是明擺著的嗎，為甚麼不早點走？殊不知我們今天有這樣的覺悟，得感謝之前好幾代改革家們的努力。改革意義的合法化不同於電腦的運算，它不是一個邏輯運作的程式。我們的前輩只能站在他們時代的地平線上看問題和想問題，他們不可能預知我們今天的變化。

當初譚嗣同寫《仁說》這本書，差不多是翻箱倒櫃，最後在宋明理學那裏找到一個口子，從那裏開出一條路來，再在那條路的終端跟西方的「平等」觀念接上軌。那還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意義上的「平等」概念

嗎？當然不是，譚嗣同的修辭製造了一種變化，所以他所倡導的「平等」不可避免地偏離了西方的論述，但因此贏得了不少仁人志士以及後來的辛亥黨人的認可（參閱Xiao, 1996）。再說科學，嚴復選擇用文言文——那是文化精英才會使用的語言——來翻譯達爾文主義者赫胥黎（Huxley）的 *Evolution and Ethics*（《進化與倫理》），他想通過這種典雅的翻譯來證實一點：西方的進化論其實是跟中國人過去信奉的「天道」相通的，因此用古人的語言來闡述洋人的科學理論，也是說得通的。當然，他的翻譯也不可能是準確的翻譯。我分析了嚴復的《天演論》，發現他所翻譯的「進化論」結構性地偏離了原版的進化論（Xiao, 1995）。但對當時的維新運動來說，這個偏離不重要，重要的是讓「物競天擇」這個觀念在中國的土壤裏生根落戶了。

我要說的是，任何一種改革都在尋求概念或意義之間的銜接，但是在新與舊、本土與外來之間，並沒有兩個對應的概念是可以天衣無縫地對接到一起的，我們只能尋求創造性的對接，改革修辭家需要開發出一種（或一組）意義來完成對接，而他可以利用的修辭資源只能來自本土文化。文化本身有豐厚的修辭資源，亞里士多德也說了：「不管碰到甚麼事情都能發現可資利用的說服手段」，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改革修辭家能否圓滿完成傳統與變革、本土與外來的創造性對接，還取決於改革修辭家本人對這些修辭資源的理解和把握，一般來說，理解得越深透，把握得越充分，修辭家可資利用的說服手段就越多，應用起來也越得心應手。

這就不能不說到一個文化的意義系統，不能不說到一個細緻入微的文化視野。

為甚麼說「文化視野的缺失」

改革修辭家要有良好的文化素養，這自不待言。我做中國改革運動的修辭分析時，發現不從文化傳統入手，很多概念說不清楚。譬如我在碩士期間分析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發現要理解毛澤東的這篇報告，不能不去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獻，因為當時共產黨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很多論述來自新文化運動，尤其是來自後期的《新青年》雜誌。而要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那些激進的反傳統言行，又不能不去閱讀之前的辛亥革命和維新運動的文獻。而要理解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為代表的維新話語，又不能不再追溯之前的洋務運動。接著又發現洋務派的很多變革理念來自18世紀的經世派(參閱魏源，2004；高王凌，2007；鄭大華，2007)，那時候英國人還沒有打過來。接著又發現，這個講究經世致用的學派又跟17世紀明清之際崛起的以王夫之(1619–1992)、顧炎武(1613–1982)、黃宗羲(1610–1695)為代表的實學派很有些淵源。為甚麼明清時期會出現一個注重實用和實證的學派？我還要再讀王陽明的心學、朱熹的理學……之後，我直接讀四書五經，因為發現近現代的改革家們喜歡引用《易傳》中有關變通的論述和《禮記·禮運篇》中有關大同的論述來合法化自己的主張。

改革修辭的文化視野

在這種回溯性的比較閱讀中，我明顯地感覺到這些學派都試圖從前人的話語資源中尋求某種偏離的合法依據。毫無疑問，這些學派在其形成之初都是改革學派，成功的意義和修辭建構讓他們的改革論述成為了一個時代流行的精英話語。不同時代的改革話語體系在許多問題上的意見相左，但不否認它們都分享基本的問題意識，也不妨礙它們借助於內和外、虛與實、體與用、道與器等二分法框架而相互依存，並在各自的領域繼續發揮作用。正是由這些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改革話語疊加而成的話語和意義層積，構成了後來改革運動博大精深的文化視野，改革運動豐厚的修辭說服資源就來自這樣的文化視野。改革運動的修辭家們不能不依賴和利用這樣的文化視野。

改革修辭分析的文化視野

同樣，作為改革修辭的探索者，我們也需要有這樣一個文化視野，才可能深入理解改革運動及其意義的修辭建構。假如沒有這樣一個文化視野，修辭分析難以展開，更難以深入，我們只能說些字面上

的理解，而且還只能限於我們今天的理解。如是，我不知道該如何去閱讀和理解過去的改革修辭文本，我們不但無法接近那個時代的意思，也無法領會文字背後的豐富涵義，這樣，我們又如何去分析它們的修辭？我們失去的不只是一個廣闊的文化視野，我們還放過了一個豐厚的意義蘊藏。

那麼，我為甚麼還要特別強調這個「文化視野」的「細緻入微」？這是修辭分析自身的要求。修辭分析者們相互比拼的除了細緻還是細緻，這也許就是修辭分析相比於量化的內容分析和結構性的話語分析最明顯的不同。我們沒有大數據，沒有大面積的掃描和統計，我們有的只是細節，我們只能比拼對於細節的把握和理解。在閱讀中我們容易錯失一些微小但可能是重要的細節，也許是因為粗心，也許是因為我們對文字的感覺還沒有足夠的敏銳，也許是因為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它們不重要，為此，我們不能不強調細緻入微。修辭分析者還會特別關注語言變化的細節，這些變化細節也許蘊育著某個新的說法、新的視角，乃至於新的改革理念。你還真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在哪個不起眼的變化細節裏跑出個「魔鬼」來，那可能就是一個不受主流文化歡迎的改革者。

修辭分析需要一個細緻入微的文化視野，文化也需要細緻入微的修辭建構和修辭分析，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從某個意義上說，文化的細緻入微來自於修辭建構和修辭分析的細緻入微，當然，這裏說的文化視野，指的是我們可以清晰地呈現和說明的那部分文化視野。

中國近／現代轉型研究的文化視野：以美國學者為例

那麼，解釋一場重大的社會改革運動，是不是非要從文化入手？這麼說吧，我們不是非要說到文化，但如果要深挖這場運動的思想來源和預判它的走勢的話，我們還是要從文化上來刨根問底。我們不妨看一下美國史學界是如何解釋中國的近現代轉型的，之所以要提美國史學界，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大多借鑒甚至接受他們的看法。

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開山鼻祖是 John King Fairbank (費正清)，他就沒有從文化進入，而是直接把中國放進了西方大歷史觀的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架裏去考察，他認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不幸地主導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進程。在他看來，「鴉片戰爭」只能算是「歷史的巧合」，英國和中國碰巧在鴉片貿易的紛爭上打起來了，他認為導致中國和西方戰爭衝突的真實原因是「西方擴張不可遏制的活力和中國制度墨守成規的惰性」(費正清、賴蕭爾〔Reischauer〕，1992：281)。這樣來解釋中國當時的處境，顯得後來很多發展都是命中註定了的：仗是必打的，中國是必輸的，中國人要擺脫困境，只有改革，而改革也只有一條正途，那就是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發展模式。中國人在這個過程中好像沒有可以說上話的地方。

只是到了美國第二代、第三代關注中國的史學家，才開始把注意力逐步轉到中國的文化上來，因為中國後來的發展，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的強勢介入來解釋，更不能簡單地套用一個所謂普適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中國人的回應，包括60年代發軔的洋務運動、90年代的維新運動、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以及接下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傳播，要從中國自身那套能動的文化機制上來解釋。新一代的西方史學家於是潛心研讀儒學經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等等，他們實際上把中國文化看作了一套能動的、從某種程度上也是變通的意義系統。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他們陸續發表了一些頗有見地的書，包括Metzger (1977)的*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Lin (1979)的*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Fourth Era*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Chang (1987)的*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危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尋求秩序與意義》)等。值得指出的是，這些作者是思想史學家，不是修辭學家，所以不能指望他們從一個修辭學的角度來解釋中國近代以來的改革運動；但有趣的是，如果能認真讀進去的話，會發現一些微妙的變化。在〈「現代轉型」論述的缺憾：一個語藝學者的考察〉一文中，我嘗試從一個修辭學的視角重新閱讀西方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論述，結果發現一些思想史學家多多少少轉向了一個修辭學的分析視角(肖小穗，2014)。

順帶說一下，以上沒有提到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這個名字對中國思想史界來說如雷貫耳。在我看來，這位思想史學家特別的地方在於他的史學觀，他認為一部思想史其實是環繞各種問題意識 (problématiques) 所展開的對話和辯論 (轉引自林同奇，2006：253、258-259；參閱林毓生，2006：239-241)。這是我非常欣賞的一種史學觀，一部改革修辭的歷史不也是這樣的嗎？不正是因為這個「環繞各種問題意識而展開的對話和辯論」，才激發了那些實學派、經世派、洋務派、維新派……，以及他們的改革言論和修辭韜略來的嗎？

文化的修辭說服機制

文化人類學者格爾茨 (Geertz, 1999) 在《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一書中把文化看作是意義的網絡，我認同這個定義。在這裏我斗膽做一點補充，我們已經知道，修辭有把意義整合和重新整合到一起的功能，我因此相信在這個複雜的意義網絡的深處，有一些基本的修辭規則在運作。既然說修辭是講究變化和製造變化的話語，那麼我有理由相信這些修辭規則是一個文化意義網絡變動不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來源。這些修辭規則也在另一方面解釋了文化的實用性和勸諭功能。

我相信沒有一個文化是死水一潭的，不能適時變通和與時俱進的文化沒有資格留在這個世界上，那些活下來的文化都一定有一套靈活應變的修辭說服機制。我由此推斷中華文化有兩套說服機制，平常主持大局的是一套鼓吹安定團結的說服機制，這套機制勸說人們抵禦各種誘惑和干擾，堅持既定的做法。可是每當國運到了「窮則變」的境地，第二套機制就會出來說明「變則通」的道理，它會說服人們思危圖變。第二套說服機制來自文化最幽深的地方，這就是為甚麼每到改革的關頭，總有一些人要從故紙堆裏、從古聖人的話中尋求合法偏離的依據。文化需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所以平常這套尋求變革的說服機制「按兵不動」，但是該出手時就出手，讓文化得以完成自身的浴火涅槃。一個重大的文化變革的成敗，其實取決於改革者如何善用這套「思危圖變」的說服機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我發現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中國的這套「思危圖變」的說服機制啟動了。這是怎樣一套修辭說服機制？我目前還不十分清楚它的複雜構成，但我的研究經驗告知，這套機制起碼包括了這樣一些修辭規則：

1. 鼓吹和論述變通的修辭規則；
2. 建構一套新的神聖話語的規則；
3. 建構一個新的隱喻範式的規則；
4. 重新劃分本末、體用、道器等重要範疇的規則。

為甚麼說改革「主體」的缺失

修辭是一種微觀話語，改革修辭並不例外，儘管它所依仗的文化視野博大精深，但最終還必須依附一個積極勇為和腳踏實地的「主體」。當代修辭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本來就對修辭的「主體」有特別的要求：他必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訴求的個體或群體；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假定他能因勢利導、因時制宜，敢於創新，積極把握自身的命運。這裏雖然說的是修辭的「主體」，但改革的「主體」不也應該這樣嗎？遺憾的是，這樣一個積極勇為和腳踏實地的主體在我們傳播學的改革運動研究中並不多見。

決定論的陷阱

改革運動研究容易陷入各種型態的決定論，諸如歷史發展趨勢決定論、客觀情境變化決定論、政治經濟結構決定論等。在發展趨勢、客觀情境、政治經濟結構這樣一些泰山壓頂的力量面前，改革的主體，譬如費正清的大歷史觀下的中國改革者們，顯得勢單力薄、微不足道，他們怎麼想並不重要。其實別說是改革主體了，就是改革修辭也顯得軟弱無力，難有用武之地。

值得我們小心提防的還包括這樣一些隱蔽的決定論，它們藏匿於不少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設之中，而這些研究方法在目前還相當流行，

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法則 (law) 取向和近似這一取向的研究方法。就拿改革研究常用的兩種方法來說吧，先說實證的量化研究，研究者要不就把改革主體置於一堆變量之中，主體怎麼想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發現這些變量會對主體的行為、認知和態度造成甚麼影響；要不就把改革主體的文本交付量化處理，為了便於把某些部分抽取出來統計，研究者還得事先把文本原有的意義結構給拆解了。再說結構性的話語分析，這種分析大多假設改革文本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意義結構，如是，改革主體怎麼想也是不重要的，因為文本的聲音最終取決於這個意義結構。

我是這樣看的，當你否認這個世界上有甚麼決定論的時候，你離修辭學的主體觀不遠了。如果你不再從決定論的角度來解釋人類歷史，那麼你基本上會同意，歷史是活在當下的當代人創造的，他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能動的，命運不是掌握在別人手裏，而是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選擇自己要走的路，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當然也在承受這一選擇的代價。如果說歷史的發展有它必然的那一面，那只是因為它被一群有志之士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推動著，人們堅定的信念、意志和堅持不懈的努力，解釋了歷史非偶然的那一部分。這就是為甚麼我最後要來說改革的「主體」。

作為新聞改革主體的第一線新聞工作者

下面，我想就一個具體課題的研究發表一下看法，它就是我們自己的新聞改革研究。讓我先確立一個觀點，就新聞改革而言，我認為改革的主體首先指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這些人不一定站得高看得遠，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必須為自己邁出的每一小步提供必要的理據。新聞改革就是靠著這群人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正是他們一點一滴的摸索，給了我們今天說的新聞和媒體改革豐富的意蘊和價值。

我不否認上層的作用，鑒於中國的國情，改革離不開上面的支持。但問題是，上層不參與新聞的日常實踐，他們會拿筆去寫新聞嗎？他們需要自己動手來處理一個通常不能見報的新聞事件（譬如弱勢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群體抗爭)嗎?再說,他們也不第一時間瞭解坊間發生的事。他們最多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劃一些圈圈或幾道紅線,新聞改革該如何操作,還得依賴下面的努力。事實上我發現,過去劃下的圈圈和紅線也是可以修辭性地改寫的。我相信新聞改革要怎麼走、改革的意義是甚麼,不是預先就敲定好的,改革是摸索出來的,改革的意義是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一開始誰都不知道會走成甚麼樣子,你也不知道那地方走得通還是走不通,第一線的工作者才是最先跳到水裏「摸著石頭過河」的人。把這些人看成是不折不扣的執行者,或者是被動的傳聲筒,這本身就是一種形式的改革主體缺失。

海內外學生和學者都關心中國的新聞改革,我們的《傳播與社會學刊》時不時收到探討中國新聞改革和媒體改革的文章。我因為長期參與這個學刊的編輯工作,讀了不少這方面的來稿。非常遺憾的是,大部分來稿沒有把心思放在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身上;其餘的來稿,雖然關注了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但由於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也沒有能夠完整地呈現這些改革的主體。

改革主體的缺失

先說大部分的來稿。我們不妨想像一下,這部分來稿不以新聞實踐為中心,不以活躍在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為主體,那麼作者會如何來解釋中國新聞媒體的改革呢?

我自己做了一個調查,發現有這麼幾種做法。一種是仰仗組織和行政的手段。譬如一些來稿研究90年代《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等幾家廣東報紙的改革,作者只是說了這些報紙如何開放、言論如何大膽,並沒有接著去分析這些大膽言行的策略和技巧,似乎這幾家報紙除了膽子夠大之外,不需要別的甚麼能耐。那我們只能推測這幾家報紙的背後有靠山,要不就是廣東省委開明,要不就是中央給了廣東優惠的言論政策,才給這些大膽的報導和言論開了綠燈。事實上,如果不去分析這些大膽報導和言論的修辭技巧,不去分析新聞工作者如何巧妙地實現他們的「合法偏離」,那我們就只能從組織和行政賦權上來理解這些大膽的報導和言論。

再就是偏重於考察傳媒政策的演變，這仍然是仰仗上方的力量。我們習慣了看上頭的活動，所以寫傳媒改革的歷史時，往往寫成一部傳媒政策調整和演變的歷史。但我相信改革的原動力不是來自某個先知先覺的決策者，而是來自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這些人最先覺察到某些既定政策的潛在問題，也最早尋求解決的辦法。當然，是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用他們擅長的方式，譬如打個擦邊球，把球打在政策的灰色地帶上。

還有一種做法是把改革歸因於外部的社會力量，譬如民眾的力量。舉例來說，現在民眾的某些示威抗議活動可以見報了，這類抗議活動一般針對地方政府的某個侵權行為。媒體報導這類抗議活動是開放的表現，但學者解釋這類社會衝突議題為甚麼可以進入官方的報導管道時，往往偏向了民眾一方的積極作為，譬如說他們成功地爭取到更高一級政府和傳媒的支持。我不否認民眾和社會的力量，但我相信傳媒自己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們也主動配合，也積極尋求報導這種活動的機會，可惜這一方的積極作為沒有受到重視。

又或者是歸因於傳媒自己的人脈關係。據我所知，一些研究者跑去採訪勇於改革創新的媒體，想知道他們為甚麼可以成功地突破某些既定的做法，研究者問這些媒體的老總或者編輯：你們是不是找人了，跟上面疏通了，在人事上搞定了，研究者想得到這方面的訊息。這種研究依然是盯著上面，這樣做還不屬於前面說的依靠組織來解決問題，因為沒有走正常的組織程序，而是利用我們通常說的非制度性資本，包括自己的關係網絡和在政府裏的人脈關係，來解決與制度的衝突。我可以理解研究者的這些問題，傳媒經常要做這樣的事，問題是，這方面的訊息能幫助說明改革嗎？找上面的人擺平、搞定，不正好說明了改革的失敗？再說，這樣做保得了一時，保不了一世，等保你的人完了之後，你的那點改革也跟著沒了。改革的正道是拿出充分和有力的理據來，把這個帶引號的「偏離」正當化了、合法化了，改革應該是堂堂正正的，是可以攤在桌面上說的，不是偷偷摸摸的。

以上這些做法基本上繞過了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自然也繞過了他們的報導手法和修辭策略。我們有大張旗鼓的新聞和媒體改革，卻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者，這就讓人非常困惑，那些衝在改革的風口浪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尖上的改革主體們哪裏去了？那些要為自己每一小步的「偏離」製造合法依據的新聞工作者們哪裏去了？這就是我說的改革「主體」的缺失。

猶抱琵琶半遮面

還有為數不多的來稿照顧到了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一些來稿探討他們的報導和言論策略，這是修辭學者所期待看到的。相信是得益於這些新聞工作者拿捏得當的報導和言論，像維權、弱勢群體、群體性事件、公民抗爭、地方政府侵權、官員貪腐瀆職、媒體更正、道歉等敏感的新聞主題，逐步進入到官方的媒體渠道來了，說明新聞工作者的改革努力日漸發酵了。遺憾的是，目前採用的研究方法如問卷調查、內容分析等難以完整呈現這些改革的主體。

改革主體可以具體到某個人(如記者、評論員、專欄作者、編輯等)、某個群體(如採寫小組、製作團隊等)，或某個媒體。要比較完整地呈現這些改革主體，就需要給他們一個相對完整的自我呈現的時間和空間。但是在大部分的改革研究中，這些改革主體能攤上的時間和空間非常有限，目前普遍的做法是選擇若干媒體在若干年內的報導和言論，在這種廣撒網的樣本中，改革主體是誰根本就不重要。即便是我們最後有可能定焦到某個改革主體身上，這種以量取勝的做法也還是犧牲了主體呈現的細節和深度。

此外，我們還需要把改革主體和他身處的情境聯繫起來，改革主體的意識和訴求與他當時某段特別的經歷和感受有分不開的關係，這就需要我們近距離和設身處地去考察他們的處境，圍繞這些改革主體的問題應該是具體和切身的，譬如他們遭遇了甚麼？身陷怎樣一個困境？他們如何擺脫這一困境？在他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資源(主要是資訊和說服的資源)？他們是否利用了和如何利用這些資源？但是我發現，很多來稿只是不痛不癢地交代了一個「客觀大環境」，那都是些宏大和寬泛的敘述，不外乎國內外形勢的壓力，國家、市場、公眾等幾種社會勢力的緊張衝突等，那是所有新聞工作者都在面對的客觀現實，這些宏大和寬泛的敘述不能幫助我們理解改革主體的真实處境和他們改革的良苦用心。

再說改革主體的報導和言論策略，這是改革修辭分析的重心。我最期待的是這樣一種分析，它專注一個具體問題的解決，譬如一篇通常不能見報的新聞、一張通常不能刊登的照片，或一個通常不能公開談論的話題是如何得到合情合法的處理的。讓人欣慰的是現在一些傳播社會學、傳媒歷史學和媒體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來探討改革媒體的報導和言論策略。這些年來我們學刊也發表了一些視野開闊、分析獨到的文章，儘管它們不完全出自一個修辭學的視角，但提出的問題為修辭學者指引了可行和前景可觀的分析路徑。譬如這樣一些問題：新聞媒體如何可以借助於危機處理的賦權突破政府及新聞的常規運作，如何可以利用地方與中央的不同偏好開拓自主創新的空間（潘祥輝，2011），如何可以在維護黨國利益的議題上與國家議價（楊銀娟、李金銓，2010），如何可以在權力與資本的夾縫中塑造去政治化的地方公共性（莊梅茜，2016），如何可以憑藉社交平臺的技術力量和相應的話語調適來解決民眾訴求與黨國訴求之間的內在衝突（李艷紅、龍強，2017），如何可以建構起支持市場化改革的話語形構（陳鵬，2020）……，這些是社會學者、歷史學者、政治經濟學者眼中的媒體策略，這部分策略的視野恢宏、高屋建瓴，值得修辭學者重視和參考，因為在修辭學者的眼中，它們也屬於宏觀層面和具有戰略意向的修辭策略。

我現在關心的是這部分媒體策略的「主體」，這還是我說的那個有血有肉、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訴求的改革主體嗎？不像是，因為這時候的媒體已經走出它的具體情境，來到了國家和社會的場域，成為了黨國體系中的一個子系統，或者是社會結構中的某個功能性存在。在這裏媒體獲得了更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我們不能不承認改革開放帶來了相對寬鬆的局面，感謝過去四十年來市場開放、權力分層、媒體自謀生路、新媒體技術突飛猛進、資訊賦權、民權運動、弱勢群體意識提升等接二連三的風雲變幻，才讓媒體在而今的「亂世」中有了跟國家和各級黨政部門議價和博弈的資本，才有了在調控期間和「夾縫」中斡旋和縱橫捭闔的餘地，也才讓學者們有了探討以上媒體策略的可能。一部分學者偏向使用另外一套術語來評述媒體的新行為，他們評估「議價」、「博弈」、「斡旋」等行為對整個黨國體系運作的有效性和合宜性，並且嘗試找出媒體行為背後的社會機制，把媒體的積極作為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因於這些機制的開放性和能動性，而不是歸因於媒體人對時勢的敏銳把握和積極有為、因地制宜的行動對策。在媒體策略的問題上，我們再一次繞過了第一線的改革主體。

「議價」、「博弈」、「斡旋」等最終要靠人來執行，這些研究也拿出了自己的案例分析，顯示參與行動的新聞工作者的確付出了自己的主觀努力。遺憾的是，由於研究方法的局限，我們只是被告知有這樣一些行為，並沒有看到一個完整的「議價」、「博弈」或「斡旋」的過程。社會學者、歷史學者、政治經濟學者所看好的媒體策略無疑都是改革修辭研究的重大課題，但要處理這些課題，修辭學者還得一個一個案例來分析。在案例分析中，分析者只能回到那個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訴求的改革主體上來，這意味著修辭學分析還不能簡單套用傳播社會學、傳媒歷史學、媒體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策略」概念，分析者還必須假設改革主體在回應一個具體和切身的情境，改革主體的策略還必須是與情境互動磨合的結果，改革主體的處理手法還必須是其匠心獨運的產物。

結語

一個研究領域的視角/視野總要受制於該領域對若干重大問題的基本看法。既然是研究，就不能迴避有關研究對象的本體是甚麼，有關這一本體的知識如何獲得，以及在研究中甚麼是需要優先考慮等深層次的問題，研究者對於相關的本體論、知識論、價值論問題必須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和說辭，起碼來說，研究者需要在這些問題的諸多可能的答案中作出自己的選擇和承諾，因為這決定了研究者如何籌劃和執行自己的研究。

我不代表所有的修辭學者，但我相信今天很多修辭學者會同意這樣一些看法：人們可以策劃自己的行動來達到預期的目標，而不僅僅是對外界作出反應。行為依賴於情境因素，而不是受普遍法則的制約；人類歷史的發展取決於人審時度勢的主體作用，而不是取決於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現實是話語和觀念實踐的產物，而不是獨立

於話語和觀念的客觀實在；知識是人們對現實的一種解釋和假說，而不是對現實的純客觀反映。學術研究要幫助解決具體問題，而不能只是產生新的知識；研究不可能完全擺脫研究者本人及其社會/文化價值取向的影響。正是對這些基本看法及其他相關看法的執念和假設構築起當代修辭學自家的主體城府和它與其他傳播學領域區隔的邊界。

但儘管我們平時各自做自己的研究，這不等於說我們沒有合作的空間，更不等於說沒有相互借鑒的可能，畢竟在促進媒體改革研究這點上，我們的大目標一致。我們需要從事與媒體改革相關的所有分析，包括宏觀的國內外形勢分析、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參數分析、國家與媒體關係的動態分析，以及媒體制度演變機制的分析。作為修辭學者，我們需要參照傳播社會學、傳媒歷史學、媒體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傳播領域的分析來開放思路、拓展視野。與此同時，我也在這些領域的新聞改革研究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研究到最後大都殊途同歸地導向一個修辭解決方案。例如林芬（2018：28）把新聞報導中隱含的衝突劃分為6種類型：

1. 指向個體的政治性衝突；
2. 指向個體的非政治性衝突；
3. 指向體制，建議體制改進的政治性衝突；
4. 指向體制，建議體制改進的非政治性衝突；
5. 指向體制，號召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政治性衝突；
6. 指向體制，號召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非政治性衝突。

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正如林芬所說：「六種類型的衝突的邊界不是固定不變的：同一個議題，報道方式不同會激發不同類型的衝突……」如是，如何界定一個社會衝突事件之衝突類型的主動權便來到了媒體一方，為了說服體制接受某個衝突事件，媒體需要選擇婉轉的報導方式，譬如採用相應的歸因策略和框架手法來規避與體制的正面衝突。潘祥輝（2011）以汶川地震和群體性事件為例，探討危機事件如何促進中國媒介制度的演變，最後得出結論：「政府、媒體與公眾的共識及利益的重合度是決定媒介制度變遷能否固定下來的關鍵變數」。明眼人看出，這個結論也為新媒體制度的確立提供了一個理想的、一攬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子的修辭解決方案，執行這一方案的主體只能是媒體，它必須通過各種積極有效的斡旋來促成政府、媒體、公眾三方的「共識及利益的重合度」。

我們和美國的很多社會運動研究者一樣，最終遭遇到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意義建構」上來尋求解決方法。鑒於敏感的新聞事件總是發生在一個沒有先例的特定情境之中，這個「意義建構」還必須是創造性的修辭建構，其目的無非是我前面說的「偏離的合法化」和「新舊概念/意義的銜接」。這裏說的媒體斡旋也屬於這樣一種修辭建構，「斡旋」的意思不是要媒體拉起一個隊伍去跟體制談判，而是在文本、意義和理解上來動心思、下功夫；在現有的國家—媒體架構下，新聞改革的前景主要來自於謀求理解層面的軟著陸，而不是謀求行動層面的硬著陸。在如何促進新聞改革研究的問題上，我不是要建議大家都來當一回修辭學者，只是強調在新聞和其他傳播領域的改革研究中修辭學視角有其不容忽略的價值和貢獻。事實上，我發現許多學者在其案例研究中已經或多或少地貢獻了一些改革修辭的分析。

改革運動研究，尤其是新聞改革研究，目前還只是打開了局面。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等待我們來處理，在改革的重要節點上還有許多重要的案例需要做深入細緻的文本和話語分析。改革運動研究就像是一個接力賽，在這個賽道上還真不能少了修辭學研究這一棒。

註釋

- 1 兩位西方學者Marwell和Oliver(1984, pp. 4-5)比較了許多社會運動的定義，發現學者們對「社會運動」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大部份學者都相信社會運動的定義應包含以下四個元素：(1)運動有明確目標，目標是使社會有所改變；(2)有某種組織；(3)有一定規模和延續性；以及(4)有一定程度的反建制的越軌行為。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推行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屬於體制內的改革，以上第四個元素看似不適用於這部分改革。但因為這地方沒有明確「反建制的越軌行為」要到達怎樣一個程度，考慮到共產黨的這部分改革同樣要求某種體制的變革，也同樣遭遇到體制和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說這部分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反建制的越軌行為，也還是說得過去的。

- 2 有關這一新研究取向以及它與社會結構/理性選擇取向的關係，Morris 和 Mueller (1992) 編著的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有更為詳細和深入的論述。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波拉克斯 (2014)。《古典希臘的智術師修辭》(胥瑾譯)。北京：吉林出版集團。(原書 Poulakos, J. [1995]. *Sophis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Greec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Bolakesi (2014). *Gudian Xila de zhishushi xiuci* (Xu Jin Trans.). Beijing: Jilin chubanshe. (Original work: Poulakos, J. [1995]. *Sophis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Greec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陳鵬 (2020)。〈改革之聲與改革之生：話語形構如何支持國企市場化改革 (1995–2000)〉。《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53 期，頁 163–189。
- Chen Peng (2020). Gaige zhi sheng yu gaige zhi sheng: Huayuxinggou ruhe zhichi guoqi shichanghua gaige.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53, 163–189.
- 費正清、賴蕭爾 (1992)。《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Fairbank, J. K., & Reischauer, E. O. [1979].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ydney: George Allen & Unwin.)
- Fei Zhengqing, & Lai Xiaoe (1992). *Zhongguo: Chuantong yu biange* (Chen Zhongdan Trans.). Nanjing: Jiangsh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work: Fairbank, J. K., & Reischauer, E. [1979].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ydney: George Allen & Unwin)
- 馮仕政 (2013)。《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Feng Shizheng (2013). *Xifang shehuiyundong lilun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高王凌 (2007)。〈18 世紀經世學派〉。《史林》，第 1 期，頁 150–160。
- Gao Wangling (2007). Shibashiji jingshi xuepai. *Shi Lin*, 1, 150–160.
- 格爾茨 (1999)。《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Geerci (1999). *Wenhua de jieshi* (Han Li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work: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李艷紅、龍強 (2017)。〈新媒體語境下黨媒的傳播調適與「文化領導權」重建：對《人民日報》微博的研究(2012–2014)〉。《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9期，頁157–187。
- Li Yanhong, & Long Qiang (2017). Xinmeiti yujingxia de chuanbo tiaoshi yu “wenhua lingdaoquan” chongjian: Dui *Renming Ribao* weibo de yanjiu (2012–2014).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9, 157–187.
- 林芬 (2018)。〈權力與資訊悖論：研究中國媒體的國家視角〉。《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5期，頁19–46。
- Lin Fen (2018). Quanli yu zixun beilun: Yanjiu Zhongguo meiti de guojia shijiao.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45, 19–46.
- 林同奇 (2006)。〈他給我們留下了甚麼？史華慈史學思想初探〉。許紀霖、宋宏 (編)，《史華慈論中國》(頁252–296)。北京：新星出版社。(原作發表於2003年《世界漢學》第2期，頁38–66。)
- Lin Tongqi (2006). Ta gei women liuxia le shenmo? Schwartz shixuesixiang chutan. In Xu Jilin, & Song Hong (Eds.), *Schwartz lun Zhongguo* (pp.252–296). Beijing: Xinxing chubanshe. (Original work: Lin, T. [2003]. Ta gei women liuxia le shenmo? Schwartz shixuesixiang chutan. *Shijie hanxue*, 2, 38–66)
- 林毓生 (2006)。〈史華慈思想史學的意義〉。許紀霖、宋宏 (編)，《史華慈論中國》(頁237–246)。北京：新星出版社。
- Lin Yusheng (2006). Schwartz sixiang shixue de yiyi. In Xu Jilin, & Song Hong (Eds.), *Schwartz lun Zhongguo* (pp.237–246). Beijing: Xinxing chubanshe.
- 劉亞猛 (2018)。《西方修辭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Liu Yameng (2018). *Xifang xiucishi*. Beij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 脈動廣告 (2020年4月26日)。〈傾斜圖書館〉。取自騰訊視頻：<https://v.qq.com/x/page/t09571ih9pa.html>。
- Maidong Guanggao (2020, April 20). Qingxie tushuguan. *Tengxun shipin*. Retrieved from <https://v.qq.com/x/page/t09571ih9pa.html>.
- 潘祥輝 (2011)。〈論中國語境下的危機事件與媒介制度變遷的內在關係〉。《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5期，頁33–70。
- Pan Xianghui (2011). Lun Zhongguo yujing xia de weiji shijian yu meijie zhidu de neizai guanx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15, 33–70.
- 魏源 (2004)。《皇朝經世文編》(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長沙：嶽麓書社。
- Wei Yuan (2004). *Huangchao jingshi wenbian* (Wei Yuan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Ed.). Changsha: Yuelu shushe.

- 肖小穗 (2014)。〈「現代轉型」論述的缺憾：一個語藝學者的考察〉，《中華傳播學刊》，第26期，頁35–62。
- Xiao Xiaosui (2014). “Xiandai zhuanxing” lunshu de quehan: Yige yu yi xuezhe de kaocha,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26, 35–62.
- 亞里士多德 (2005)。《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Aristotle [1947]. *The art of rhetoric* [J. H. Freese, Trans.]. London: Heinemann)
- Yalisiduode (2005). *Xiucixue* (Luo Nianshe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work: Aristotle [1947]. *The art of rhetoric* [J. H. Freese, Trans.]. London: Heinemann)
- 楊銀娟、李金銓 (2010)。〈媒體與國家議價研究：中國大陸廣州報業的個案〉。《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4期，頁47–74。
- Yang Yinjuan, Li Jinquan (2010). Meiti yu guojia yijia yanjiu: Zhongguo dalu guangzhou bao ye de ge 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14, 47–74.
- 鄭大華 (2007)。〈嘉道經世思潮與晚清思想的近代轉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77–86。
- Zheng Dahua (2007). Jiadao jingshi sichao yu Wanqing sixiang de jindai zhuanxing. *Nanjing daxue xuebao (Zhaxue · renwenkexue · shehuikexueban)*, 6, 77–86.
- 莊梅茜 (2016)。〈方言節目與大陸新時期的地方媒體政治：以《百曉講新聞》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7期，頁161–189。
- Zhuang Meiqian (2016). Fangyan jiemu yu dalu xinshiqi de difang meiti zhengzhi: Yi Bai Xiao Jiang Xinwen weil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7, 161–189.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itzer, L. (196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 Rhetoric*, 1(1), 1–14.
- Campbell, J. A. (1986).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grammar of culture: The case of Darwin's *Origi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2(4), 351–376.
- Cathcart, R. S. (1972).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ovements: Defining movements rhetorically. *Western Speech*, 36, 82–88.
- Chang, H. (1987).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signy, S. (1974). Rhetoric and its situations. *Philosophy & Rhetoric*, 7(3), 175–186.
- Garner, R. (1997). Fifty years of social theory: An interpretation. In R. Garner and J. Tenuto (Eds.),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ical Guide* (pp. 1–58). Scarecrow Press.
- Garrett, M., & Xiao, X. (1993).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revisited.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3(2), 30–4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Griffin, L. (1952). The rhetoric of historical mov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8(2), 184–188.
- Hoffer, E. (1951).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 Harper & Row.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n, Y-S. (1979).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fourth er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arwell, G., & Oliver, P. (1984).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In L. Kriesberg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Vol. 7, pp.1–27). JAI Press.
- Metzger, T. A. (1977).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A. D., & Mueller, C. M. (Eds.). (1992).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ich, W. (1946).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3rd ed.). Orgone Institute Press.
- Seeley, J. (1967).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International Science Press.
- Xiao, X. (1995). China encounters Darwinism: A case of intercultural rhetoric.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1(1), 83–99.
- Xiao, X. (1996). From the hierarchical *ren* to egalitarianism: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rhetorical medi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2(1), 38–54.

本文引用格式

肖小穗 (2023)。〈改革運動的修辭學探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4期，頁207–238。